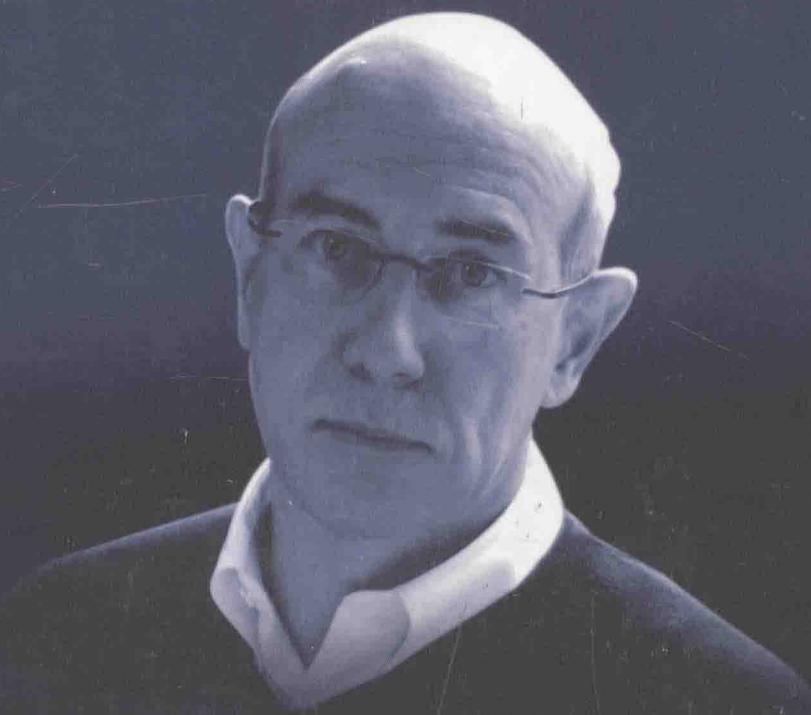


外研社学术文库·世界著名语言学家系列讲座
Eminent Linguists Lecture Series



附DVD-ROM+MP3



德克·希拉茨
认知社会语言学十讲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BY

Dirk Geeraerts

主编 李福印 (Thomas Fuyin 吴) 张炜炜 (Weiwei Zhang) 高远 (Yuan Gao)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外研社学术文库·世界著名语言学家系列讲座
Eminent Linguists Lecture Series



附DVD-ROM+MP3

德克·希拉茨 认知社会语言学十讲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BY

Dirk Geeraerts

主编 李福印 (Thomas Fuyin Li) 张炜炜 (Weiwei Zhang) 高远 (Yuan Gao)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克·希拉茨 认知社会语言学十讲 =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by Dirk Geeraerts: 英文 / (比) 希拉茨 (Geeraerts, D.)
著.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8
(世界著名语言学家系列讲座)
ISBN 978-7-5600-8529-6

I. ①德… II. ①希… III. ①认知科学: 社会语言学—研究—英文
IV. ①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1422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董燕萍

封面设计: 袁 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市鑫霸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22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00-8529-6

* * *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物料号: 185290001

前言

2009年6月德克·希拉茨（Dirk Geeraerts）教授应邀作为“第七届中国认知语言学国际论坛”的主讲专家来京作了10场讲座。本书根据讲座录像整理而成，是“世界著名语言学家系列讲座”的系列出版物之一。希拉茨教授现担任比利时鲁汶大学（University of Leuven）定量词汇学和变异语言学研究小组主任，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词汇语义学、词汇学、词典学及其交叉领域。希拉茨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其博士论文（鲁汶大学，1981年）是对范畴原型理论模型的可能性在欧洲的首次探索。作为国际期刊《认知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希拉茨教授对认知语言学在国际上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负责1993年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的主办工作，并于1999年到2001年担任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主席。本次论坛期间，他利用讲座的形式详细讲述了自己在认知社会语言学领域中的重要思想。

本书每讲配有讲义、汉语导读、主讲人的DVD录像和MP3格式的讲座录音。

参加本书英文文稿转写和汉语导读撰写的人员有：张炜炜、丁研、袁文娟、尹书颖、胡亚男、杨洁、熊丽勤、郑玲艳、马赛和李令敏。本书主编逐字逐句全面勘误后交由主讲人全面修改定稿。主讲人在最后定稿时删除了录像中的个别口误、重复、插入语以及讲座现场与听众交流的内容。因此，本书既与录像保持高度一致，又可以独立使用。

“中国认知语言学国际论坛”是由北京六所高校联合举办的连续性学术活动。论坛的组织工作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学院语言学研究中心承担。邀请专家的经费主要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合作处。希拉茨教授的讲座为2009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专家短期讲学重点项目（项目批号：Z0959；项目执行人：李福印）。本届论坛的协办单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福印 thomasli@buaa.edu.cn

张炜炜 weiwei.zhang@arts.kuleuven.be

高远 gao-yuan@vip.sina.com

Preface

The present text is a transcribed version of the lectures given by Professor Dirk Geeraerts in 2009 as the forum speaker for *The 7th China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IFCL7). Professor Geeraerts holds the chair of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Leuven.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volve the overlapping fields of lexical semantics, lexicology, and lexicography. His involvement with Cognitive Linguistics (CL) dates from the 1980s, when his PhD was one of the first in Europe to explore prototype-theoretical model of categorization. As the founding editor of the jour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h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text is published, accompanied by its videodisc counterpart and Chinese guide, as one of the *Eminent Linguists Lecture Series*.

CIFCL provides a forum for eminent international CL scholars to interact with Chinese audiences. It is a continuing program organized by six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The main organizing institution for CIFCL7 is Beihang University (BUAA); its co-sponsors include Tsinghua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and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Professor Geeraerts's lecture series was supported by *The Beihang Grant for International Outstanding Scientists* for 2009 (Project number: Z0959, Project organizer: Thomas Fuyin Li).

The transcription of the video, proofreading of the text, and publication of the work in its present book form, have involved many people's strenuous inputs. The initial drafts were done by the following: Weiwei Zhang, Yan Ding, Wenjuan Yuan, Shuying Yin, Yanan Hu, Jie Yang, Liqin Xiong, Lingyan Zheng, Sai Ma, and Lingmin Li. Then we editors did the word-by-word and line-by-line proofreading work. To improve the readability of the text, we deleted the false starts, repetitions, fillers etc. The published version is the final version approved by the speaker.

Beihang University (BUAA)

Thomas Fuyin Li

Weiwei Zhang

Yuan Gao

汉语导读

第一讲

The Social Turn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

希拉茨（Geeraerts）教授在第一讲中主要关注了两个问题：认知语言学发展中是否存在统一的因素？如果存在，那么认知语言学将来该向什么方向发展？

为回答以上两个问题，希拉茨教授介绍了认知语言学的发展简史，给出了认知语言学在整个语言学发展历程中的定位，并指出认知语言学发展的主要潜在趋势，最后给出了方法论及理论上的结论。

认知语言学的30年发展史可分为三个阶段。（1）前驱阶段（1975—1987）：其代表性研究有 Talmy (1975) 对焦点/背景的研究；Langacker (1976) 的认知语法研究；Lakoff (1977) 的“完形”模型 (“gestalt models”)。（2）扩张阶段（1987—1996）：代表性事件有 Langacker (1987) 出版了《认知语法基础》(*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Lakoff (1987) 出版了《女人、火和危险的事物》(*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Rudzka-Ostyn (1988) 编著了《认知语言学中的研究课题》(*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第一届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召开并出版发行了《认知语言学》期刊 (*Cognitive Linguistics*)。（3）巩固阶段（1996—2007）：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的教材和参考文献，并有多个国家成立了认知语言学协会。

希拉茨教授将20世纪的语言学发展也分为三个阶段：（1）去语境化阶段（decontextualization）。索绪尔语法（Saussurean Grammar）虽然对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作了区分，前者为社会性系统（social system），后者为个体活动（individual activity），但两者之间却存在一个缺口，即个体系统（individual system）。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Chomskyan Grammar）利用语言能力（competence）这一概念填补了索绪尔语法中的缺口，但因对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performance）的区分又造成了新的缺口，即语言的社会性。由于排除了语言的社会性因素，生成语法认为语法是自治的，可从各种语境中脱离出来，如社会语境、具体语言使用中的话语语境、语义和经验的认知语境等。（2）去语境化阶段的初期反应阶段。去语境化阶段中被丢弃的语言部分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渐发展为独立的学科。社会语言学的出现弥补了生成语法对语言社会性研究的缺失，语

用学的产生使人们更多地关注语言运用，形式语义学则侧重研究语法中的语义因素。(3) 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阶段。认知语言学的产生，恢复了对于语义、词汇、语言运用和社会语境的研究，认知语言学代表了再语境化的趋势。

希拉茨教授总结了认知语言学如何代表再语境化的趋势：(1)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反映出其认同语义的语境化概念，语义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认知类型共存的，如现存范畴与多义词、百科知识与框架和理想认知模式、普遍认知能力与识解等。(2) 基于使用的方法论考虑到了具体语言使用中的话语语境，如对语言结果和使用中方言的相互作用研究、词汇的语篇作用和构式的话语语境背景研究。(3) 认知语言学中的生物文化(biocultural)语言学和语言变体语言学填补了对文化的社会语境和各种语言变体(lectal variation)研究的空白。认知语言学内部的不同侧重点都反映了对语法系统性的再语境化。

将这一语境性扩张与认知语言学发展历程进行对应，我们不难发现：前驱阶段以及巩固阶段主要关注基本概念；扩张阶段关注与语境相关的各种概念，如构式语法(Goldberg 1995; Croft 1999)、基于用法的方法论(Barlow & Kemmer 2000; Tomasello 2003)、语言变体研究(Kristiansen & Dirven 2008)。

至此，我们已能够回答本讲开始提出的两个问题：认知语言学比其他任何语言学流派更能代表再语境化的趋势；若我们认同语义、结构、语篇和各种语言变体共同作用于语法现象，那么，多因素语法模式可谓是再语境化语法的极佳体现。

第二讲

Types of Semantic and Categorial Variation 语义变异和范畴变异的类型

本讲承接第一讲，继续为整个系列讲座构建基本框架。希拉茨教授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认知语言学如何考察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影响？认知语言学如何将其对意义及范畴化的关注转化为对语言变体的研究？为回答上述问题，希拉茨教授采用了“三步走”的方式，分别对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意义的类型和相关术语以及系列讲座的整体结构作了介绍。

希拉茨教授认为，要界定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必须先明确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体系中，我们该如何理解语言系统。他指出，语

言使用者的行为是语言学的最基本现实，语言系统只是对语言行为中出现的模式进行抽象和概括。语言使用者学习语言的过程并不是将自己与所谓的系统进行校正的过程，而是在社会互动中与其他语言使用者相互调整的过程。由于每个人的接触范围有限，这些调整（alignment）都是不完全的，并具有各自的社会结构。因此，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体系中，语言变体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用法的语言变体研究存在两个基本角度：一个是社会角度，主要研究语言发生（language production）的差异；另一个是认知角度，主要研究语言认识和态度（language perception and attitude）上的差异。前者是传统社会语言学的关注焦点。例如考察不同年龄、性别、阶级的人群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一直是典型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近年来社会语言学中的新兴范式——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又开创了在语篇层面上研究语言的社会差异的方法。但是，社会语言学的主流依然没有涉及语言认识和态度的作用，即语言使用者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对其他人语言行为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对语言使用者日后语言行为的影响。而这正是从认知角度研究语言变体的主要任务。

从认知角度研究语言变体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希拉茨教授只选取了这一领域的一部分，即意义和范畴化。他从词汇学（lexicology）的两个转变入手，引出对意义类型和相关术语的介绍。希拉茨教授指出，词汇学在重点研究对象上发生了两次转变：第一次转变是从对结构，如语义场（lexical field）、分类（taxonomy）等的研究转到了对显著性（salience）的研究；第二次转变是从语义显著性（semasiological salience）到称名显著性（onomasiological salience）。语义显著性和称名显著性是认知语言学的意义和范畴化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希拉茨教授对这两个术语进行了详细阐释。

语义显著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外延上（extensionally），体现为一些词汇范畴内的某个成员比其他成员更加突出；在内涵上（intensionally），体现为描述范畴中心成员的特征在对整个范畴进行定义中具有更大的权重，也就是中心成员具有最多的范畴特征。例如，心理学实验显示，在“水果”这一范畴中，苹果、草莓、香蕉、柠檬的显著性排序为：苹果>草莓>香蕉>柠檬（>表示“大于”）。与之相应，苹果具有最多的水果特征，它是木本植物的可食性种子部分，味甜，多汁，可用于制作沙拉。相比之下，草莓不是木本植物的种子部分，香蕉无汁，两者各缺少一项特征。而柠檬不甜，也不能用于沙拉，缺少两项特征。

称名显著性与语义显著性形成对照，两者的不同来源于语义学（semasiology）与称名学（onomasiology）在意义和形式匹配方向上的差

异。语义学是从形式到意义，即给定一个词汇，然后考察该词的意义；而称名学是从意义到形式，即给定一个事物，然后考察人们使用什么词汇来表达这一事物。因此，称名显著性是指在对某事物进行命名选择时，某些称名比其他称名更容易被使用，尽管所有这些称名都适用于该事物。称名显著性可分成两种：概念称名显著性（conceptual onomasiological salience）和形式称名显著性（formal onomasiological salience）。概念称名显著性出现在不同层次的范畴选择中。例如，对于一棵美洲五针松，人们可以称它为植物、树、常青树、松树或美洲五针松。这些范畴的具体程度不同，而其中某些范畴比其他范畴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体现的就是概念称名显著性。形式称名显著性是指在形式不同而意义相同的一组词汇，某些形式比其他形式更具显著性。例如 *underground* 与 *subway*，在英国前者具有形式称名显著性，而在美国后者具有形式称名显著性。

在介绍完术语之后，希拉茨教授在本讲结束部分预告了其余各讲的内容。其中第三讲和第四讲围绕语义变化（semasiological variation）展开，第五讲和第六讲考察概念称名变化（conceptual onomasiological variation），第七讲、第八讲和第九讲则侧重于形式称名变化（formal onomasiological variation）。

第三讲

Diachronic Prototype Semantics 历时原型语义学

本讲中，希拉茨教授继续深入探讨三种意义变化形式：语义变化、概念称名变化和形式称名变化，并指出语义变化主要研究原型性（prototypicality）和一词多义现象（polysemy），概念称名变化研究概念识解的差异，而形式称名变化则侧重同义词研究。本讲主要阐释词义变化。

希拉茨教授首先提出问题：既然语义和范畴化的过程中充斥着变化，我们能否通过考察语义范畴的历史演变来证明这些变化的存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介绍了两个案例研究，一个涉及单义词的语义，另一个涉及多义词的语义。

案例一：考察词汇 *legging*（紧身裤或打底裤）从1988年到1992年期间的语义发展过程，以期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回答：*legging* 的语义在

尼德兰语和佛兰芒语^{*}中有无区别？该研究的语料主要来自尼德兰语和佛兰芒语的时尚杂志。研究者首先结合杂志上的图片和描述从六个维度：长度、宽度、折缝、材质、功能和服饰穿着者的性别来划分 *legging* 的语义成分，接着通过定量分析对比了 *legging* 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出的不同特征，并找出其所有用法都包含的最中心、最原型的特征，即“紧身、有弹力的女用长裤”。该特征正是 *legging* 的原型语义。

希拉茨教授用“洋葱比喻”来解释这一语义现象：词汇的核心语义即类似洋葱的中心，而 *legging* 的其他边缘意义则类似洋葱的外层。以上是从共时的角度考察该词的多义现象；从历时的角度，我们发现 *legging* 的中心意义在语义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稳定，而相继出现的新颖意义则是围绕原型语义沿着上述六个维度逐渐发展变化的。

至于 *legging* 的称名变化则涉及到如何选择和如何优选的问题，即选取怎样的认知参照点来命名指示对象，以及如何判断哪种命名更好。例如，当你站在衣柜旁，面对一条挂着的牛仔裤时，也许你会问旁人“穿这条牛仔裤好吗？”或者“穿这条裤子好吗？”，这就是所谓的称名选择（onomasiological choice）。而形式称名变化则涉及指称性同义词（denotational synonyms）的选择，从而体现不同语言变体间的关系。*legging* 这一个案研究中，反映了尼德兰语和佛兰芒语间的一些常规关系，与尼德兰语相比，*legging* 在佛兰芒语中的内部变体更多，也更多地受到了法语的影响。

案例二：荷兰语多义词 *tuimelen*（跌倒）的语义发展。从收集的语料（时间跨度从16世纪到19世纪）来看，它的意义可以划分为九类。研究发现 *tuimelen* 的语义扩展主要基于三种方式：字面近似（如“跌倒”、“旋转”、“在枢轴上转动”）、隐喻近似（如“比喻性的旋转”）和转喻（如“摇摆”）。研究者对 *tuimelen* 进行语义要素划分，如是否以自己为轴转动、是否接触地面、动作方向是否朝下和动作是否具有目的性，并判断 *tuimelen* 不同意义所包含的语义要素。例如，对于义项“翻筋斗”而言，其语义要素包括：以自己为轴转动、接触地面、动作方向朝下、具有目的性。同时，希拉茨教授指出对于 *tuimelen* 的语义变化，可用三种方式表征法：利用放射性网络，按照语义出现的年代顺序表征法、混合性家族相似性表征法和整体线性表征法。

通过以上个案研究，希拉茨教授得出以下结论：(1) 当前语义结构模型将变化性融入了语义范畴的架构之中，历时研究可从语义角度和称

* 为区别术语，我们将比利时北部地区使用的荷兰语，即 Belgian Dutch，翻译为佛兰芒语，而荷兰地区使用的荷兰语，即 Netherlandic Dutch，翻译为尼德兰语。

名角度来印证变化性的重要性。(2) 单义词和多义词体现出来的变化性特征具有较强相似性：具有主导地位的意义是逐渐扩展的，不同意义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多维度、非原子性的网络结构。(3) 研究结果还表明社会因素在变化的多维度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 *legging* 的语义发展就和它在特定阶段的流行程度密切相关。

第四讲

Stereotypes, Prototypes and Norms 常规原型、原型和规范

在上一讲中，希拉茨教授主要讲述了语义变化问题。本讲在上一讲的基础上，主要探讨语义变化的社会因素，分为如下四部分：第一部分简介语言变化具有社会属性的原因；第二部分详细讲述帕特南（Putnam）的“意义理论”；第三部分指出帕特南理论的不足；第四部分教授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模型，用以解释影响语义变化的社会因素。

一、语义变化具有社会属性的原因。

- (1) 语义变化在本质上具有社会属性。
- (2) 词语的中心语义被该语言社区的所有成员所共享，边缘语义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小团体之中。
- (3) 语义的社会争议性（讲座中以“克林顿性丑闻”事件为例来讲述语义所引起的社会争议）。

二、帕特南的“意义理论”。本部分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帕特南意义理论中的语义广义论和语义狭义论，以及作者对于常规原型和原型关系的探讨。

(1) 严格的指称（语义广义论）

该理论认为意义不存在于大脑中。帕特南以“孪生地球”的例子来说明地球上的水和“孪生地球”上的水具有相同的形态特征，只不过“孪生地球”上水的分子式不是 H_2O ，而是 XYZ。对于生活在两个星球上的人来说，在17世纪50年代以前（那时，水的分子式还未被发现），他们对于水这一概念的理解是相同的。但随着科学（尤指化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大家发现两个星球上的水的外延是不同的，即两个星球上水的分子式是不同的。此例论证了意义不存在于人脑中，而是取决于事物本身所隐含的核心含义。自然界中的范畴严格地给每一个事物都指定了一个特有的核心含义。

(2) 语言分工（语义顺从论或语义狭义论）

该理论认为，掌握意义需要分工，一个语言社区的所有成员并不需要都知道事物的隐含结构，可以通过语言分工确保一部分专家掌握这部分含义就可以了。外行人可以根据科学家、专家的理解来调整他们对于语言的使用。

(3) 常规原型和原型的关系

常规原型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一范畴的外延所产生的社会上固有的、确定的少量数据。例如人们对于水的定型概念包括无色、无味、透明液体等。

帕特南的理论为人们从社会语义学的角度丰富原型理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常规原型和原型具有形似之处，即都确定了事物的核心语义概念。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常规原型等同于对原型的社会阐释。

三、对帕特南理论的挑战。

(1) 语义广义论与认知语言学的“反核心主义论”相冲突，语义顺从论（语义狭义论）与原型理论的动态性、扩展性相冲突。帕特南的理论是语义广义论和语义狭义论的结合，而原型理论则可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

(2) 帕特南的理论存在描写缺陷：首先，从语义狭义论来看，相关专家不一定就是科学的，帕特南的理论解释的是自然状态的事物，但是语言中还包括很多描写其他方面的词语。其次，人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决定是否依赖于专家，例如，你会要求一杯加冰的威士忌，而不是加水的威士忌，但是从专家的角度而言，冰和水的隐含核心是一样的。最后，权威之间同样有争论和分歧，对于很多事物，不同的权威看法并不一致。

四、希拉茨的模型。在帕特南的理论中，他强调了社会语义因素的重要性；即服从权威。但是除了这一点，还存在其他的因素，例如冲突、合作等因素。另外，巴奇（Bartsch）认为语义变化不是对语言规范的背离，而是遵循更高层次的规范，即交流原则。

希拉茨教授根据前人的理论，总结了三种社会语义因素，即：

(1) 语义合作因素：该模型基于巴奇所描绘的原型理论，并作了进一步的语义扩充。现存的语言行为规范应该向词语新的使用方式扩展，但是这种一定程度的背离（即背离现有的语言规范）是可以被社会所接受的，因为它符合更高一级的规范，即交流原则的需求。

(2) 语义权威因素：当人们对某一事物存在争议时，则会参考在这一领域被认可的专家意见（按帕特南的语言分工理论，他们不一定是科学家），由此得出权威这一因素。

(3) 语义冲突与合作因素：当出现不同的语义选择或存在语义争论

时，合作与冲突因素就能发挥作用。虽然一些争议是在借鉴权威的基础上解决的，但同样也存在不需要权威也可以解决争议的情况。

希拉茨教授的最终模型融合了以上三种因素，并且适用于不同背景下的社会形态，并向限制或扩充两种不同的方向发展。

第五讲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Metaphors 隐喻的文化史

希拉茨教授将本讲归属为概念称名变化中的第一个实例。所谓概念称名变化，即范畴化不同，对世界范畴化识解的不同。

本讲从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基本隐喻 ANGER IS THE HEAT OF A FLUID IN A CONTAINER（愤怒是容器中液体的热度）谈起。该隐喻被广泛认为是以人类生理现象为基础的，而希拉茨教授认为该隐喻的范畴化还具有其他来源，其隐喻化的过程展现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独特性。

作为引子，希拉茨教授首先阐释了去字面化 (deliteralization) 这一概念，即随着世界观的改变和科学的发展，某类范畴可能会失去其字面意义。例如，荷兰语中 *walvis*（鲸鱼）就经历了去字面化的过程。词根-vis 表示鱼类，随着科技进步，人们意识到鲸鱼不属于鱼类，是哺乳类动物，该词汇字面上的名称、字面上的范畴化就丢失了其理据，而被视为一种隐喻性、象征性的用法。因此，范畴化的过程不仅涉及为我们难以理解的事物寻求近似模型，同时也为动因含糊的范畴寻求近似解释。另外，希拉茨教授指出隐喻思维也具有两种类型：一类用于理解世界；另一类用于理解语言本身。

本讲着重介绍了 *emotion*（情感）概念去字面意义的过程。希拉茨教授以一系列引文为例，追述了 *emotion* 的历史渊源，并讨论古法语动词 *émouvoir* 的语义变化，以及随着时间发展，*émouvoir* 和 *mouvoir* 的称名变化。在背景介绍中，希拉茨教授指出历时语文学存在三条研究主线：原型、语法化和历史隐喻。本讲属于历史隐喻这一研究方向。

为论证隐喻 ANGER IS THE HEAT OF A FLUID IN A CONTAINER 不是由普遍生理反应所激发的，而是具有其文化特殊性这一观点，希拉茨教授引入了一个医药史上的重要理论，即体液理论 (theory of humours)——人体内具有四种基本体液（黏液、黑胆汁、黄胆汁和血液）。人的健康依靠四种体液的平衡，人的情感也与这四种体液有关，类似于中国文化中

的“五行之说”。例如，莎士比亚在其戏剧中利用 *choler*（胆汁）的概念来表达生气的情感，这是由于在当时的医药理论中，胆汁过多，人便易怒。因此，莎士比亚戏剧中关于生气的概念隐喻具有特定的历史性、文化性医学根源，而不是由普遍生理现象激发的。

接着，希拉茨教授具体考察了概念 *emotion* 的由来。语料主要来自法国旧时国王私人医生康梯（Evrart de Conty 约 1330—1405）的著作。研究旨在揭示：(1) 在语义变异方面，*émouvoir* 从字面意义到心理解读意义并不是隐喻性的语义发展，而是通过体液链接语境；(2) 在称名变异方面，与体液相关的解读并非 *émouvoir* 所特有，*émouvoir* 的心理解读和 *mouvoir* 的字面意义都经历了逐渐发展的历时性过程。所谓链接语境（bridging contexts）就是指同时包括人体体液的实际传输和心理学诠释的引文。在 *émouvoir* 的符号学分析中，我们发现这个动词在现代法语中只与心理学解读有关，但在历史上却是一个多义词，可在空间和心理上有双重解读，链接语境将两者结合起来。这里的链接语境就是体液理论。围绕第二个研究主旨，教授简要回答了现行的语义专有化（specialization）从何而来的问题，他认为原因可能是人们倾向于避免使用同义词。此外，教授进一步列举了一些 *mouvoir* 的语料，它与 *émouvoir* 一样展现了多义词的特点，从空间→生理、心理→心理解读。

然后，希拉茨教授展示了语义专有化的发展史。他利用四种语义类型、四个法语发展的时间点，绘制出平面图，从中可以看出词义分布。希拉茨教授为大家详细说明了读图方法，并通过 *émouvoir* 的语义变异讨论了语义专有化的产生。同时，对比 *émouvoir* 和 *mouvoir* 的词义分布可以看到在语义专有化的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图示。从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到情感和心理解读来源于对人体内液体运动的字面指代。

最后，希拉茨教授总结了本讲的两点结论：(1) *émouvoir* 和 *émotion* 包含的体验性概念并非如克韦切什（Kövecses）所言有普遍性，而是具有其文化特征；(2) 现代法语中以上两词及其在英语中的同源词具有形象性，经历了去字面化的过程。因为遗失语言表达原始的字面基础，我们则会重新解释其含义，这也就形成了另一种不同的隐喻来源。

由此，我们可辨识比喻表达（figuration）和去字面化这两种不同的隐喻类型。显然，后一种具有文化和历史独特性，这也意味着语言中的范畴化是由历史决定的。这与认知语言学中隐喻研究的发展相呼应，即研究重点由隐喻的体验性基础向情境体验性（situated embodiment）转移。所谓情境体验性，就是指在我们的经验中加入了文化因素，而这些文化因素显然对语言及其内部的范畴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若隐喻研究的重点发生以上转移，研究人员便要致力于隐喻的文化和历史研究，

那么认知语言学便不能脱离历史语言学。

第六讲

Cultural Models of Language Variation 语言变体的文化模型

希拉茨教授首先从十讲的总体框架入手，指出“语言变体的文化模型”属于概念称名变体（conceptual onomasiological variation）的研究范围。本讲主要关注语言变体的四种文化模型：理性主义模型、浪漫主义模型、民族主义模型和后现代主义模型。

文化模型是概念称名研究的一项核心内容，但文化模型在人们对于语言的认识活动中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我们能否发现导致语言冲突的根本性文化模型全谱，并找出其内在逻辑？

为回答这些问题，围绕“人们把语言当成交流工具”或者“人们把语言当成身份认同的表征”这两个基本影响因素，希拉茨教授提出了四种不同的文化模型：理性主义模型和浪漫主义模型，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模型严格区分了两个基本影响因素；民族主义模型和后现代主义模型，这两种综合性的模型采取相互融合的取向，即不再分离两个基本要素而是兼容并蓄。需要强调的是不论语际关系还是语内关系，四种模型都适用。在这里，语际关系指各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语内关系指一种语言内部的各种方言变体之间的关系。希拉茨教授在本讲中更多地关注语内关系。

从历史史料入手，希拉茨教授分三个阶段讲解了各种模型的产生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18世纪产生了对语言变体的两种不同看法——理性主义模型和浪漫主义模型，这是语言变体的文化模型的两种原型；19世纪民族主义模型诞生；20世纪后现代主义模型诞生。贯穿全文的中心思想是，运用文化模型的理念来解释人们对于语言变体的态度和认识。

理性主义模型认为语言是一种交流方式，标准化语言（standard language）是社会参与的中性介质，语言变体会阻碍交流。最优交流要求最大限度的一致是标准化的内在逻辑；交流的中性介质应具备地理广泛性（geographical generality）、社会中立性（social neutrality）和主题通用性（thematic universality）；标准化语言需要一种通用的可及性，即教育。地理广泛性指标准化语言不能仅仅是一省或几省的语言，社会中立性则指标准化语言不能仅仅是社会精英们所使用的语言，而主题通用

性指使用标准化语言可以谈论任何话题。持理性主义观点的人往往从受教育机会、社会流动性、民主参与性甚至语言改革等方面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希拉茨教授引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大革命中的两段言论，对理性主义模型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接着，希拉茨教授解释了浪漫主义模型。持浪漫主义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方式，标准化语言是社会排他性的压制中介，语言变体代表不同的身份认同。希拉茨教授就浪漫主义模型与理性主义模型相对立从地理广泛性、社会中立性和主题通用性这三方面入手，分析了浪漫主义反对标准化语言的内在逻辑。浪漫主义者惯用的论点就是标准化语言会威胁到语言的多样性和身份的认同，甚至可能是纯语言主义的先兆。希拉茨教授就当代关于语种灭绝（linguistic genocide）的某一讨论来具体阐述了浪漫主义模型的观点。

作为此部分的小结，希拉茨教授简要介绍了关于语言起源的哲学认识，其中理性主义的代表为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Condillac），浪漫主义的代表为德国哲学家赫尔德（Herder）。此后便进入了民族主义模型的阐释。

在关于民族主义的辩论中，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逐渐找到了融合点。融合的内在逻辑就是在多大程度上确保交流，在多大程度上表达身份认同。理性民族主义趋向于普遍主义，即最大限度的民主涉及整个民族；最大限度的交流需要一种世界语。但迫于现实，这些要求降低了，比如对于民主参与来说，一个政治团体内部需要一种共同语言，而不是整个国家。而浪漫民族主义则有个人主义倾向，即最终认同是对个体的认同，最大的多样性是针对个人主义的。同样受限于现实（无法相互理解的危险），这些要求降低到要求一群人（一个文化或民族团体）共用一种语言，而不是要求人人都有自己的语言。在这样两种极端对立的趋势中，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都可能会伴随着独立于政治的某种身份认同向中间融合。一个国家就是一种身份认同。希拉茨教授仍以18世纪法国大革命中的相关例子进行分析，认为此例已体现出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互融合的趋势。实际上，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很少以纯粹的单独形式存在。同时，希拉茨教授指出民族主义模型并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融合过程，它存在着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分界问题，即民族国家内部民族之间的冲突；二是教育问题，即以教育为名强加身份认同，否认多样性。讲座中，希拉茨教授着重讲解了第一个问题。

由于民族主义模型存在问题，为寻求解决之道，后现代主义模型诞生了。后现代主义产生于20世纪后期，试图摒弃分离的逻辑而采用连结

的逻辑来解决民族主义模型中存在的问题。浪漫后现代主义提倡多种身份认同，理性后现代主义则提倡多种语言并存。可惜民族主义模型中的两个问题在后现代主义模型中并未完全解决。希拉茨教授详细讲解了后现代主义模型中的分界问题。与民族主义模型不同的是此处群组认同的分界问题已演变为功能领域的分界问题，如英语在高等教育中的功能范围是怎样的？英语作为国际科技领域的通用语言其功能范围又如何？作为欧洲联盟的机构语言又如何？

最后，希拉茨教授对四种模型进行了比较总结，并指出了其中的矛盾和冲突。教授把结论归纳为如下四点：(1) 对语言变体的认识主要有趋异和趋同两种趋势。(2) 把语言分析限定于一种或几种模型之中是不正确的做法，对语言辩论进行分析应考虑到各种影响因素。(3) 所有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4) 辨认模型并不代表解决矛盾冲突。

第七讲

Lexical Variation as a Sociolinguistic Variable 作为社会语言学变量的词汇变异

从第三讲到第六讲，希拉茨教授陆续介绍了语义变异和概念称名变异的相关研究，本讲开始进入形式称名变异领域，主要关注同义词的选择问题，即同义词或类同义词（synonymous or near-synonymous forms）之间的各种变体变异（lectal variation）问题。

引子部分，希拉茨教授在“方言测量”（dialectometry）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语言变体测量”（lectometry）这一术语，即测量各种语言变体之间的定量关系。关于各种语言变体测量的研究通常都会涉及到标准化（standardization）的问题，即人们用什么模型来表示标准语和方言之间的关系；以及从描写性的角度来研究标准化问题，如关注不同方言之间、方言与标准语之间究竟有怎样的相似程度等。本讲向读者展示了如何利用具有形式称名变异的同义词来研究各种语言变体（lects）之间的历时和共时关系。

首先，希拉茨教授介绍了本讲的理论和方法论背景。德国语言学家奥尔（Peter Auer）提出的方言与标准化语言模型很好地阐述了方言和标准语的关系，奠定了本讲的理论基础。简言之，该模型将欧洲方言和标准化语言群集分为三类：(1) 双语制（diglossia）：本土标准语和基本方言是两个分离的层面；(2) 通用语双语制：本土标准语和基本方言之间